

然而縱觀全書，讀者不禁要問，本書所討論的湖南人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作者主要關心的是近代湖南省歷史影響較大、社會地位較高、受教育層次較高的群體，他們在意識形態上具有一定的傳承關係和共同特徵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他們作為湖南人的代表，在塑造地方文化認同的過程中也會遭遇底層階層的反抗，這些對作者來說是很難解釋的，在全文敘述中將湖南人看作一個沒有意識形態分歧的整體，這在筆者看來，還有可以討論的空間。其次，湖南思想文化的傳統是否只有屈原、賈誼、王夫之？或者說，自曾國藩以下，作者討論的郭嵩燾、譚嗣同、楊毓麟、楊昌濟、毛澤東等人在思想上是否僅限於王夫之思想的影響？各個時期，在不同的需求下，知識份子對王夫之的解讀大有不同，並且後輩對前輩有一個反思的過程，這種解釋是不錯的，但也使討論受到限制，比如對楊度後期的活動缺少觀照，對梁啟超等「外省」人帶來的影響簡約化處理等等。第三，雖然作者討論了留日湖南學生的活動和思想，但仍然感覺局限於湖南內部，很難想象這些在日本的留學生只與本省人打交道，只受到本省文化的影響，並且在思想意識上完全統一。另外，僅從私人關係來解釋思想上的傳承似乎有點片面，每個人生活的大傳統和思想上受到的小觸動都可能影響其思想的發展，所以作者很難解釋楊毓麟既傳統又反傳統的心理狀態，而此特徵正是他們那一代人的集體特徵。

陳瑤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Jerry H. Bentley, Renate Bridenthal, Kären Wigen, eds. ,
*Seascapes: Maritime Histories, Littoral Cultures, and
 Transoceanic Exchang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x, 261pp.**

本書的14篇論文源於在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召開的一次研討會，涵蓋海盜、航員、遷移、種族、造船、貿易等相關研究領域，涉及從16世紀的奧斯曼帝國與印度洋到20世紀早期西印度港口工人在巴拿馬運河務工的政治問題。本書的編者本特利（Jerry Bentley）為「全球史」和「海洋史」的研究先鋒，夏威夷大學教授、《世界史》雜誌的主編。其成名作 *Old World Encounters: Cross-Cultural Contacts and Exchanges in Pre-Modern Tim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用「跨文化方法」取向，考察了1492年前的跨文化接觸，指出了幾種在接觸中顯現的「不同類型的轉變、衝突和妥協」，闡明了歐洲人和其他人群接觸的歷史情景。他與齊格勒（Herbert F. Ziegler）合編的《新全球史》是被廣泛採用的教材。他隨後的幾部著作所討論的也是全球史的問題，旨在研究全球動力和地方狀況的交互影響。不過，隨着「全球史」顯示出與「國家史」一樣的本質局限、史家對各種語言和背景史料運用的力不從心，以及對是否存在世界歷史統一進程和主題的質疑，一種對全球史有本質修正的「海洋史」取向日益居上。本特利1999年的文章〈作為歷史分析架構的海域和大洋水域〉（*Sea and Ocean Basins as Frameworks of Historical Analysis*）敏銳地引導了新的潮流。他指出直到19世紀中葉，歷史學家仍以民族國家為分析單位——蘭克及其後繼者所關注的主要是和其生活年代相關的政制、憲法、外交政策和民族共同體的政治經歷。其後他們漸漸認識到超越此界線的大規模歷史進程的重要性，開始關注廣大的互動地帶。本特利強調關注「商業的、生物學的和文化交流的進程」（這些既影響個體社會，也影響整體全球），以及「經濟整合、歷史分析、海事區域、大洋水域、海域和社會整合」。太平洋雖在此以前已有頻繁互動，但作者認為未達到真正意義的社會和經濟互動。16世紀晚期西班牙和其他歐洲海員開始建立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直接聯繫。到了16世紀後，「世界的所有海洋是一體的」，海事史也進入全球史範疇。概言之，本特利強調以系統的和長時段的水域（如地中海、黑海）人群互動來突破不合理的和想象的劃分（如歐洲或亞洲）。關於另外兩位編者，Renate Bridenthal 是紐約城市大學布魯克林學院退休教授，而 Kären Wigen 在伯克利大學時已受到良好的地理學訓練，這對其學術取向影響至深，現在她是斯坦福大學歷史學系東亞研究中心教授。她強調「海事區域」和面向「世界主要海洋周邊社區」的方法可以成為基於民族國家和許多其他基於陸地建構的分析方式的另一種選擇。這種方法其實在50多年前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對地中海水域的分析中已開先河，其後 Kirti N. Chaudhuri、Anthony Reid、Philip D. Curtin 相繼在印度洋水域（1985）、東南亞島嶼（1988-1993）和大西洋水域（1998）的研究上有所貢獻。所以 Kären Wigen 的取向只是擴闊前人研究的空間。

本書展示了海洋在世界史上扮演的重要角色——貿易、移民路徑、帝國航線、地中海、海盜和走私者的機會之地，使得「世界海洋區域形成的歷史事件的原創性研究匯聚在一起」。這些文章的研究取向非常多樣，或從物質、文化和知識構建的角度講述和解釋海域的歷史經驗，或着眼於政治和軍

事控制造成的影響，或以社會史的角度分析勞動組織、信息流動和族群政治意識，或處理地中海、日本海和大西洋海域的「海上破壞者」如何控制其活動領域的問題。重新認識政治、地理和文化邊界等一直為區域史學者關注的內容。此書豐富的案例提醒我們海域上人群的活動與陸上人群同樣重要，其倡導一種新的區域和全球地理學，即陸海並重的觀察，對不同海洋環境活動人群的探索、對獨特區域的進一步關注，以補充原來地理學過分偏重陸地的不足。

第一部份「理論建構」中的三篇文章，考察了島嶼、濱海、船舶和海洋空間。John Gillis 展開了對區域意義的分析和「島嶼中心視角」的建構，他認為在近代早期，島嶼是充滿各種貿易、爭鬥、易名的地方，在早期的商業、航海、移民、政治和工業革命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其立論從歐美人對太平洋島嶼的不同理解開始，力圖回答「1500至1800年間所謂的『大西洋的大洋洲』是如何發生的」，答案自然是島嶼的塑造。島的意識和概念也在美洲的進一步「融入」、造船和航海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變化，海中群島星羅密佈，船隻往來如梭，聯繫十分緊密。事實上，海島是最初的「新歐洲」。歐洲人的第一桶金其實來自海（島）而非大陸，由於新的民族國家「邊界」概念的需要，18世紀晚期陸海的界限又重新被確定了，而19世紀這種劃分變得絕對，海島也失去了聯結的作用。Hans Van Tilburg〈交易之舟〉一文的着眼點在「船」本身，他認為造船並非不言而喻的，它不僅是跨洋交易的工具，更是這種交易的產品。無論是中國帆船由於排華法案而在美國西海岸消失的例子，還是二次大戰時期美國海軍對夏威夷舢板的徵召，作者要告訴我們的是船「可以被用來貿易、出售、改造、重新命名、賦予新的標識、珍視或遺忘」，所以必須將船舶視為動態的、可變的文化形式。雖然這些例子略嫌牽強，結論亦顯得空泛，但方向仍值得肯定。Jennifer L. Gaynor 的文章講述的是海洋空間的概念如何完全變為東南亞的政治想象，政治地理的概念長期為大海（不僅只是「家鄉」）所涵蓋。以印尼為例，空間領土化的概念塑造了族群差異的構想和「海民」的反常位置。作者特別使用了「nusantara」這一概念（群島作為整體的一種環繞和非中心概念），指出其組成了印尼民族主義的「地理人」要素；而當民族主義這種政治想象確立後，「領土化」趨向強化，促成這一點的海民卻又吊詭地在政治進程中被邊緣化。作者要強調的是海洋空間如何被海洋意識所塑造。不過，基於作者選取的例證為伊斯蘭族群，究竟是海民、民族主義還是宗教原因造成這種意識仍可以討論。

第二部份「帝國」中的四篇文章，追索了領土國家通過海洋對權力的擴展，總體說是自上而下的視野。Carla Rahn Phillips 探尋的是帆船時代的早期

國家如何保持其全球帝國，因為這從信息傳播和航海技術上都有一定困難。她發現在哈布斯堡時代的伊比利亞世界，伊比利亞人將公私傳統和制度帶到海外，比如質詢會，還有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服務於商貿和防衛的艦隊，比如1573年對殖民地城鎮建立的管理和規定。不過維持海外帝國的不僅僅是法律，更有傳統及其間相互產生利益的網絡以及以家庭定義的個人忠誠。水手並非四處漂泊的「世界公民」，他們深繫於家鄉，船上的法令和社會結構經常塑造了一種地方社區的存在。所以，廣闊的海洋並未減弱傳統的強大力量。Phillips 此文從組織入手考察，兼涉傳統與心態，極具洞察力。Giancarlo Casale 將歐洲對大西洋的發現和同時期奧斯曼帝國對印度洋的發現作一對比。他發現奧斯曼並未繼承中世紀伊斯蘭世界原有的「知識」，印度洋對帝國來說是個「新世界」，其相應的認識與歐洲人對美洲的認識更是異曲同工！從知識獲取和學習速度來看，土耳其學者迅速重新掌握了印度洋世界的知識，16世紀前葡萄牙人也未能及時印刷出版新知識，雙方其實是半斤八兩。這是一個共同的「發現的時代」。當然我們似乎不應該把學者對知識的掌握等同於政策制定者或實際主事者（更無法等同於「國家」），也不應把出版理所當然地視為知識會被廣泛接受。Eliga Gould 發現大西洋西岸和南部的歐洲法律有參差，從而造成了相對分隔的社會。重疊的權利和邊界的缺失使得「邊緣者」仍有不少施展暴力的空間，海上尤其如此。美國繼承了歐洲的法權體系，但仍是一個明顯區別於歐洲的區域（如可以剝削奴隸、剝奪印第安人司法權和疆域擴展）。這種界外無罰的觀念根深蒂固，大西洋世界法權的「現代化」也未能取代它。Alan Karras 研究的是列強進行主權競爭的加勒比海殖民地，他認為加勒比海島是18世紀最好的顯現挑戰法律限制的交易場所。對三種類型口岸的闡明是本文的一大特色。最後，當然是非法活動日漸侵蝕著殖民地的根基，規則翻雲覆雨，商業也走向滅亡。作者強調商業原則需要以跨海力量為前提。

第三部份「社會學」的四篇文章，重點放在船舶和港口的社會學研究，關注點主要在海上勞工階層，包括體制力量的強迫性和勞工的應對。Kerry Ward 帶我們進入19世紀末的好望角社區。她發現好望角只是一個歐洲船隻往來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中途服務站。Ward 對好望角社區的各色人等和城市歷史，以及對荷英法葡諸國在此的勢力交錯和影響的描述頗為精彩，將該地視為航船和貿易網的次級區域也頗具識見。Alan Gregor Cobley 關注的是加勒比海地區「非洲—加勒比裔」海員的自我意識。他追溯了這種海上移動社群的歷史，探尋了這種海上離散族群的社會共同體，從這個角度看，加勒比海地

區是研究寶地，過去500年間此水域帝國歷史的互動，連續、多樣的內外移民共同交織了今日的场景，西印度海員的家庭、組織、文化和自我意識的形成絕非朝夕之間。**Risa Faussette** 研究的是加勒比海地區的另一類人——碼頭工人。這些人扼守海洋帝國的商業據點，靈活地遊走。面對美帝國的海上擴張，黑人工人懂得利用從報紙上獲得的信息來反抗種族剝削，種族和殖民勞力市場在此得以透視。**G. Balachandran** 講述的是印度水手的故事。作為大英帝國的成員，他們被有意忽視，然而卻吊詭地避開了聯邦政權的束縛，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喚起的殖民意識，卻也是獲得權利和同時被規訓的雙刃劍。總括而言，這一組文章對檔案文獻運用的分寸把握適度，非常值得學習。而且在編排上，與第二部份的「自上而下」遙相呼應，在關注下層群體的活動的同時亦顯示着國家、強權或制度權力的在場，同時也下放第四部份對突破結構分層、對群體更為精細的「人類學」式的觀察。

第四部分「違規者」描述了頗為經典的走私者和海盜的世界。**Emily Sohmer Tai** 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前近代的西方圖景：政治權力不斷試圖越海擴張，而商業利益要求不逾領土。中世紀地中海的賊寇要求的不僅是財物，還有政治利益，比如熱那亞利用海寇擴展其對地中海東部聚落的控制。因此，海賊是「政治和商業利益的互動」。海洋的經驗使一些歐洲人對政治空間的概念更具彈性，從而得以超越內陸的政治對抗模式。**Peter D. Shapinsky** 探討了15、16世紀日本領主（如野島領主，實際也是最大的海寇）在海上而非陸地的權威，發現他們在濱海區域控制着合法及非法的各種海上活動，在船隻停泊處或通道徵稅，中世「鎖國」的日本就是這樣保持寇掠與保護的平衡。在本文中，日本海寇被重新審視，對進一步探究濱海地區人群活動、家族與控制、制度與操作都具有重大意義。匹茲堡大學教授 **Marcus Rediker** 講述的是近代早期大西洋水域的犯罪與懲罰。他發現船隻和港口絕不僅僅是貿易工具和地點，在18世紀的大西洋這兩者都是劇場和舞臺：一方面，政府通過對海盜的公開審判和行刑儀式來震懾犯罪者和追隨者，另一方面，在公海船隻上的反抗者也執行着稱為「正義分配」的相同儀式，這種權力的倒置和交互性，被作者視為恐怖的現代舞臺。

總括而言，海洋史研究的局限在於其容易變得漂浮不定和難以把握。和其他方法一樣，它也容易變得局部和偏執，所以在框定海事研究區域時要慎重考慮局部與宏觀世界之間的關係。與全球史並非要研究全球的歷史一樣，海洋史絕不僅僅要研究海洋的歷史。另外，僅僅討論海洋史事，是否可以理解今日全球化的「譜系」也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在無視許多相關材料的情

況下，僅僅滿足於船隻修造和航行技術，或者從甲口岸到乙口岸再到丙口岸的事實陳述，常常是海洋史研究的誤區所在。本書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這些問題，對「時間、空間和知識」三個維度有充份的關照，對群體和個人既有結構分層，也有個體情感、心態和自我意識的探討，足以示來者以軌則。

陳博翼

北京大學歷史系

太田出、佐藤仁史編，《太湖流域社會の歴史學的研究：地方文獻と現地調査からのアプローチ》，東京：汲古書院，2007，32，354頁。

日本明清史學界在江南地區進行田野考察的傳統由來已久。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施行改革開放政策，使日本學者在中國進行田野考察再次成為可能。在諸多學術考察活動中，以濱島敦俊和森正夫等人對長江三角洲的實地考察最具影響力。濱島曾在長江三角洲的32個市、縣、鎮、村進行了多次訪談調查，對訪談調查和文獻資料進行了細緻分析，揭示出明清時期中國的民間信仰和祭祀中存在着共同性的組織，並有共同的活動領域。森正夫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市鎮進行了跨學科式的田野調查，深化了對明清以來地域社會變遷的認識。2004年8月以來，以太田出、佐藤仁史、稻田清一、吳滔、山本英史、陳來幸等中日學者為核心組成的「江南三角洲市鎮、農村調查班」，開始了對太湖流域長期的田野調查，並於2007年出版了《太湖流域社會の歴史學的研究：地方文獻と現地調査からのアプローチ》（以下簡稱《太湖流域社會》）一書。在實地考察中，這些學者有感於工業化、城市化的加劇，所見所聞均與傳統文獻中所描繪的「江南水鄉」景觀大異其趣。但隨着調查的深入，他們又發現，「值得慶幸的是，該地域現在仍然保留有足夠多的傳統農村的姿態」（頁5），這使廣泛收集傳統農村和水鄉古鎮的文獻史料，進而探討太湖流域農村社會史成為可能。通讀《太湖流域社會》全書，不難發現本書著者們始終着力於收集多層次多角度的地方文獻以及口述材料，從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等綜合視角，對當今學界頗為關注的田野考察方法進行了理論反思，並回應了1980年代由日本學者森正夫提出的「地域社會論」。